

【研究論著】 Articles

琉球對儒學的受容

The Acceptanc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Ryukyus

上里賢一 著

Kenichi Uezato

陳瑋芬 譯*

關鍵詞：京都五山、文之點、久米村、明倫堂、國學

Keywords: Kyodo gozan, Fushiten, Kume village, Meirindo, Kokugaku

* 作者為琉球大學法文学部國際言語文化學科教授（東洋文化專攻）；譯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儒學傳入琉球有兩種路徑：十三世紀到十七世紀間，精通儒學的日本僧侶抵達琉球，不僅引進並廣傳佛教，同時更傳入漢字文化並加以發揚光大。十七世紀薩摩軍入侵琉球，薩摩儒者來訪並傳入文之點訓讀法，與既存在的僧門學問相結合後，普及於琉球士族等各階層中。自此，琉球官員均須學習漢語練習、漢詩寫作及官方應用文書寫等課程。

與此同時，自從明太祖派遣招撫使赴琉球，並賜閩人三十六姓定居琉球，琉球也派遣中山王赴明，正式開啟中琉雙方持續約五百年的互動關係：中國多次派遣冊封使、朝貢船及從學人士赴琉，而琉球亦派遣學生前往國子監求學，民間前往福州就學的勤學人數更數倍之。

Abstract

There were two ways through which Confucianism came into the Ryukyus. The first one was the coming of the Japanese Buddhist monks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13th and the 17th centuries. Thoroughly versed in Buddhism, the Japanese monks also carried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Ryukyus. The second was the arrival of the Satsuma(薩摩) Confucian scholars who introduced into the Ryukyus the punctuation method for reading the Chinese books. Since then, all the Ryukyuan officials had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poetry and the writing of the official letters.

壹、儒學向琉球傳入

儒學之思想體系在近代以前的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自不待言，同時，它作為東亞思想的中樞，也具備強大的支配力量。儒學思想源自中國，隨後流傳至朝鮮、日本、安南等東亞各國後，結合了各國的政治權力，成為支配國家的意識型態。五倫、五常成為支持教育理念的主要德目，也是規範人們日常生活的道德觀念，深入社會各個階層。

琉球形成國家的過程中，腳步比朝鮮或日本來的遲緩，直到各地方統一、王國的型態逐漸整合後，才逐漸被納為中國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的一員。

儒學傳入琉球有兩種路徑：藉由日本僧侶（京都五山系）與薩摩儒者的媒介傳來，或者藉由冊封使、從客、官生（留學生）與勤學等人直接從中國引進。

一二六五年（英祖六·咸淳一）一位名為禪鑑的僧侶抵達琉球，於浦添創建極樂寺，並引入佛教。一三六五年（察度十六、洪武至正二十五）賴重法印到琉球，開設波上山護國寺。到了一四〇〇年代中葉，尚泰久王時代（1454-1460），各型寺院相繼開設，並鑄造大型梵鐘。在鐘上撰寫銘文的大多是僧侶¹。

十三世紀到十七世紀間抵達琉球的日本僧侶，不僅引進並廣傳佛教，同時更傳入漢字文化並加以發揚光大。由於這些僧侶皆是日本室町時代五山文學的支柱，除精通佛典外，對於儒教等中國學問的造詣也深。雖然這些僧侶對漢字文化的引入是以寺院為主，並未同時傳入儒教，然而就文化史而言，這是琉球與中國文化的初次接觸，因此仍可謂為一項相當重要的紀錄²。

1 請參閱小島瓊禮、金城美智子：《首里城正殿の鐘と墨繪「光と影の世界」》資料編（沖繩：沖繩總合圖書，1991年），頁106-109。

2 請參閱村井章介：《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頁182-223。

日本僧侶袋中上人於一六〇九年（尙寧王二十一、萬曆三十七）薩摩軍入侵琉球（1603年）前後抵達琉球。不久後（約在1632年左右）薩摩儒者泊如竹也來訪並傳入文之點（日本薩摩約在地方的訓讀法），這些都是琉球儒教史上的重要事件。泊如竹是江戶時期重要儒者南浦文之的弟子，南浦文之繼承了桂菴禪師的學統（桂菴禪師曾將薩摩的朱子學推廣至藩學），曾為《四書新註》加上訓讀，開創了日本朱子學的新局面。而泊如竹將薩南學派的訓讀傳統引入琉球後，為該地漢學的普及帶來極大助益。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以及鹿兒島市編纂的《薩藩的文化》等書中，都記載有泊如竹來琉球的事蹟或傳記。在此引用西村時彥於《日本宋學史》中的描述如下：

（泊如竹於）寬永九年（或云十年）漂洋渡海至琉球，時年六十三。在此之先，琉球圓覺寺有文之友人天叟禪翁，二州門下亦有文之同門景叔春蘆二僧，皆曾攜先師典籍寓跡於此。若讀南浦之文，過去亦有桂菴學派入琉球者，然如竹師事國王，為其世子侍讀。流寓琉球之明人梁澤民甚敬如竹，名其居曰顧天菴，自此琉球人能知人倫、辨禮義，至後世亦非文之點不讀，每至江戶，必購文之點四書而歸，此乃如竹教化所致³。

本段文章中蘊含許多重要的資訊：例如泊如竹往赴琉球的年齡（六十三或六十四歲），如竹之友人僧侶天叟較早入圓覺寺，桂菴學派傳人景叔、春蘆二僧亦曾至琉球，如竹與明人梁澤民熟識，以及如竹傳入文之點後，琉球所使用的文之點四書係購自江戶（東京）等等。

那麼，另外一種藉由與中國直接交流而傳入的儒學文化，又以怎樣的徑路傳播的呢？賴重法印抵達琉球七年後的一三七二年（察度二十三、洪武五），明太祖招撫使楊載也往赴琉球，而琉球也派遣中山王察度弟泰期赴

3 西村時彥（天因）：《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明治42年），頁267。請參閱鹿兒島市：《薩摩の文化》總論，第一宋學部（1975年）。家坂洋子：《薩摩薩繪卷——儒者泊如竹の生涯》（東京：八重岳書房，1982年）。

明，正式開啓兩國的外交關係。這段關係持續至約五百年後的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光緒五），琉球改制沖繩縣爲止。

在該期間內，受派遣至琉球的冊封使總計有二十四次⁴，由南京、北京的國子監而來的留學生（官生）超過一百名⁵，在福州當地就學的勤學人數也有數倍之多。另外明代初期不定期（約每年）、清朝則二年一次派遣朝貢船，進貢翌年又派遣接貢船。還有幾次是以護送漂流者、派遣謝恩使或進香使等名義，送來臨時使節。

冊封使選自考上科舉的優秀人士，他們除了通曉儒學外，也可作詩文、寫書法。而以從客身份到琉球的人中，也有不少精於詩文或書法的優秀人物。毫無疑問的，這些人對琉球文化帶來極大的刺激與影響。

以官生或勤學身份前往中國的留學生，在直接接觸以儒學爲主的中國學術文化時，也透過與各階層人士的交流，學習大國先進的文化與技術。

貳、僧門中的漢學

琉球的儒學是由日本本土的間接管道、以及由中國大陸的直接管道傳入、形構而成，最初特色各異，其後則相互融合，並得以發展。

這裡首先要由十五世紀中葉的碑文與鐘銘中，挑選一例，以窺見當時日本赴琉球的僧侶所具備的漢文知識水準。

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爲輔車以日域爲唇齒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嶋也以舟楫爲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剎地靈人物遠扇和夏之仁風故吾王大世主（庚寅）慶生（尚泰久）茲承寶位於高天育蒼生於厚地爲興隆三寶報酬四恩新鑄巨鐘以就本州中山國王殿前

4 一四〇四年（武寧九・永樂二）陳時中曾造訪琉球，冊封中山王武寧與山南王汪應祖。不列入此次來訪行程則總數爲二十五次。但其中一次爲楊載於一三七二年（察度二十三・洪武五）以招撫使而非冊封使的身份造訪琉球，因此共計有二十四次。

5 仲原善忠：〈官生小史〉，《全集》第一卷（沖繩：タイムス社，1977年）。

掛着之定憲章于三代之後 文武于百王之前下濟三界群生上祝萬歲寶
位辱命相國住持溪隱安潛叟求銘々曰

須彌南畔 世界洪宏 吾王出現 濟苦衆生
截流玉象 吼月華鯨 泛溢四海 震梵音聲
覺長夜夢 輸感天誠 堯風永扇 舜日益明

(戊寅)六月十九日(辛亥)

大工藤原國善
住相國溪隱叟誌之⁶

琉球在十五世紀中葉至後期，鑄造了三十個梵鐘。其中最著名的鐘銘作於一四五八年（尙泰久五、天順二），曾被懸掛在首里城正殿處，在琉球有「萬國津梁鐘」之稱。溪隱安潛為相國寺住職，相國寺與京都五山同名，彼此間當有所關連。當時幾乎所有鐘銘都出自溪隱安潛之手，可知他和國王尙泰久交情深厚。

一四九二年（尙真十六），首里城附近建造了圓覺寺，成為琉球臨濟宗總本山。圓覺寺於一四九四年落成，開基僧芥隱則繼承京都南禪寺，由此可知琉球與京都五山間密切的關連性⁷。

參、久米三十六姓與明倫堂

來自日本的僧侶，以首里為根據地發展漢學；相對的，來自中國福建省並定居在那霸一角的「閩人三十六姓」，則鞏固了另一個中國文化的據點——久米村。

根據《大明會典》的記錄，首次派遣「閩人三十六姓」的時間為一三九二年（察度四十三，洪武二十五）⁸。據說當時為圖琉球與明朝之間的交易方

6 同註1，小島、金城《前掲書》。

7 小島瓊禮：〈芥隱承琥傳〉，《球陽論叢》（那霸：ひるぎ社，1986年），頁575-569。

便，將優越的航海技巧教與這些居住於福建沿岸的工匠們。這些人爲自己初抵琉球的居住地命名爲「唐營」，後改稱「唐榮」，不久又改名爲「久米村」⁹。

「久米三十六姓」隨著明、清中國與東亞國際情勢的互動，以及琉球對東南亞貿易政策的轉變而時有盛衰。從一三九二年（洪武二十五）開始，到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琉球改制爲沖繩縣爲止，共計五百年間，由於冊封、進貢、慶賀等各種使節的派遣受到禁止，「久米三十六姓」遂扮演了重要的交流角色，支援琉球與中國等東亞各國之間的往來交易，並提供實務與技術上的協助。

「閩人三十六姓」抵達琉球的同時，琉球也自中山與南山等地各挑選三名留學生（官生）到中國¹⁰。雖然在明代所派遣的官生中較活躍者僅見嘉靖年間間的鄭迴、以及萬曆年間間的鄭週兄弟二人，但沿至清朝，以學成歸國的翻譯人員、或者教育者身份，在社會上活躍的人物相繼輩出，負責擔任琉球進貢使節之口譯人員、撰寫公文、甚至指揮航海與修理船隻等琉球與清朝間交易的實務工作。

琉球遣往中國的留學生，最初是由王公貴族或掌權者的子弟中挑選而出，隨後直到清末改制前，則轉爲以久米村的子弟爲主。由於派遣留學生（官生）到清朝，必須在琉球有新國王即位時，透過前來冊封的使者向皇帝請求許可等一連串的手續，所以一個新王朝成立時才得以派遣一次，可說是一種派遣時間不規律，也極不穩定的制度。

與中國間朝貢關係的維持，是琉球相當重要的國家事業之一，而相關人才的養成也是國家人才培育的重心。由於久米村負責實際上琉球與中國等東亞各國間的貿易工作，在琉球一心維繫與中國間朝貢體制的情況下，其重要性自然不可忽視。

8 《太祖實錄》中並未記載有關閩人三十六姓被下賜的相關記錄。洪武二十五年說則出現在記載琉球的《中山世鑑》、《中山世譜》中。有關中國方面的記載，見於《大明會典》卷一〇五，朝貢一，琉球國項，《明書》卷一六五，四國傳一，琉球項等書。

9 請參照〈久米村〉，《沖繩大百科事典》上（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年）。

10 同註5。

王府於是在每次派遣進貢船與接貢船時，訂定語言學習等各種目的，並以久米村的子弟為主，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被稱為「勤學」，表示與「官生」之間的區分，主要滯留在福州柔遠站（琉球館），向福州的師匠學習。

勤學的人數要比官生來的多。留學時間也比官生的三年要長，多為五年至七年。學習內容涵蓋「讀書習禮」、「曆法」、「科律」、「漢方」、「風水」等各種領域。也可見一人兩度以勤學的身份被派遣至清朝的例子，可知勤學較官生自由。同時，我們亦可由歸國留學生的活動內容得知，出身勤學的人較活躍、學習目的較明確，證明勤學這項制度的自由度、以及受到廣泛運用的程度。

久米村在一六七四年（尙貞六，康熙十三）創建孔子廟。九年後一六八三年（尙貞十五，康熙二十二）前往琉球的冊封正副使汪楫、林麟焜撰寫了〈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讚美琉球國雖然遠在海涯，久米村竟然已經建立聖廟，可見琉球文教已經蓬勃發展¹¹。

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尙敬六），久米村設置明倫堂。此堂是在程順則的諫請下設立，為琉球第一所教育機構。程順則對琉球儒學的普及與教育貢獻很大，他在明倫堂創建前十二年所撰寫的〈廟學記略〉¹²中，就已清楚展現了對教育的熱情。這份熱情主要投注在琉球的儒學史上，特別聚焦於久米村。因此，前述關於僧門學問的引入與推廣、或者薩摩朱子學等，則未曾觸及。

根據程順則所述，久米村的儒學肇始於明初三十六姓之前往琉球、以及琉球向中國派遣官生。明萬曆年間，紫金大夫蔡堅繪製聖像並置於家中祭祀、朝拜。清康熙十一年，紫金大夫金正春等人則奏請設立聖廟，康熙十三年竣工。而設置明倫堂則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11 請參照汪楫《使琉球雜錄》卷一五，（那霸：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1966年）。

12 拙編：《校訂本中山詩文集》（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98年），頁267-275。

明初三十六姓抵達琉球後不久，毛掣台、曾得魯、張五官、楊明州等四位老師也自明朝前來教育久米村子弟。事實上，這四位很可能是當時負責教育工作的教授團，目的在於培育閩人三十六姓成為琉球與中國往來交易的人才。福建省沿海出身的三十六姓，原本就精通航海技術與船隻修理，因此毛掣台等人的任務便是教授撰寫航海所需文書、與航行控管等基本知識。《歷代寶案》等文獻中留下的表文與咨文，就引用了許多儒教教典（經書），航海相關公文裡也表露出他們對經書等中國學術有很深入的瞭解。其後，自國子監留學歸國的官生，便成為詮釋經學的解說者，而深諳經學的人則擔任訓誥師，負責自久米村的出身者中培育出可傳遞學術的人物。

無庸贅言，久米村明倫堂的教育是以培育琉球對外貿易人才為主要目的，故而翻譯與撰寫公文等實務工作便成為優先選項。為了因應這樣的情況，久米村的子弟也提早接受相關教育，他們長大成人後，成為勤學、留學福州，歸國後則擔任琉球進貢船與接貢船的翻譯員、或者正議大夫等受到社會重視的職業。因此，久米的明倫堂成為一個專為久米村子弟開辦的教育機構，並未擴及首里或那霸等地的琉球土族子弟。

肆、程順則與蔡溫的儒學

本節將簡單介紹為久米村儒學的發展有重大貢獻的程順則（1663-1734，康熙二至雍正十二）與蔡溫（1682-1761，康熙二十一至乾隆二十六）的事蹟，可窺知久米村知識份子的生命軌跡於一二。

（一）程順則¹³

程順則之父泰祚（1634-1675）、母真饒古樽，生為長男。父泰祚於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以進貢都通事的身份赴清國，自北京返國的歸途中，在蘇州聽聞福州耿精忠叛亂事件，滯留該地，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因病去

13 有關程順則的傳記，請參閱〈程氏家譜〉，《那霸市史》資料篇第一卷六，家譜資料二（1980年）。

世。程順則當時年僅十三，十四歲完成冠禮，成為秀才，年俸有一石五斗。自此便在於久米村天妃宮的學習所，從學於當時久米村最受尊敬的儒學者鄭弘良。

一六八三年（尙貞十五，康熙二十二），二十一歲任通事，同年以勤學身份前往福州。翌年春，與上京使者共赴北京，並於歸途中前往蘇州父親墓前祭拜。是年冬返回福州，從學於陳元輔門下四年，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五月返國。二年後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任接貢存留通事並再次赴清，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六月歸國。第二次到清朝時，曾向福州陳元輔請教學問，並積極發展當地建設。例如於福州柔遠站設置土地祠與崇報祠，並親自撰文。此外，又曾於返國之際，自費二十五金購買《十七史》（全一千五百九十二卷），置於孔廟之內。

一六九六年（尙貞二十八，康熙三十五），三十四歲時擔任進貢北京大通事，十一月赴清，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回國。居留中國期間曾在福建出版所撰寫的詩集《雪堂燕遊草》，攜帶回國。一七〇三年（尙貞三十五，康熙四十二）受王世子尙純、王世孫尙益召聘負責於每朝講解四書、每夜則講授唐詩。是年擔任中議大夫一職（年俸五石）。

一七〇六年（尙貞三十八，康熙四十五）升任進貢正議大夫（年俸六石），十一月二十三日自那霸出港。此為四度赴清，程順則於出發前五日（十一月十八日）撰寫前述〈廟學紀略〉。文中言四度赴清已經十分習慣，因此便於啓程之前忙碌準備的餘暇執筆撰寫此文。他對於振興琉球儒學已經有一肩挑起的自覺，並將這樣的決心在文字中盡情抒發。同時，他還暗自決定在這次進貢期間，前往曲阜孔廟進行拜謁，在孔子靈前報告儒學在琉球的發展情況，表示儒教的恩澤已遠及於琉球，琉球與中國享有同樣的文化地位。

程順則一行於一七〇七年七月自福州出發，前往北京，九月二十六日抵達山東省，拜謁孔廟與孔林，獻上之前準備的〈廟學紀略〉。十二月五日離開北京，翌年三月回到福州。五月離開福建六月、渡海返回那霸，停留福建

其間，程順則出資六十金出版了《六諭衍義》一部、《指南廣義》一部以及〈焚餘稿〉（十四歲夭折的次男搏萬所撰寫的詩集）等書。

一七一三年（尙敬一，康熙五十一）任江戶慶賀掌翰史，翌年經薩摩前往江戶。途中曾向薩摩的島津吉貴奉上《六諭衍義》。又於江戶會見新井白石與荻生徂徠等人，歸途則受草津攝政近衛家熙之託，於其京都鴨川的別墅外樓創作詩文。一七一五年（尙敬三，康熙五十四）任紫金大夫，再升任總理唐榮司（久米村總役）。同年，向近衛家熙獻上康熙皇帝御製詩宸筆石摺一張、詩韻釋要一部、以及孔林楷杯。

一七一六年（尙敬四，康熙五十五）草撰〈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建議創建明倫堂並得到許可。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尙敬八）任謝恩使，並跟隨冊封正使海寶、副使徐葆光五度赴清，當時程順則已屆五十八歲高齡，但仍於翌年健康返國。歸國之際自費購買《皇清詩選》數十部（各部三十卷），並向王府內的書院、評定所、聖廟各獻上一部，其餘則分贈師友。程順則歸國的一七一二年（康熙六十），將軍吉宗命室鳩巢以和文翻譯《六諭衍義》、荻生徂徠則負責訓點，十二月出版荻生徂徠點本《官刻六諭衍義》，翌年三月出版鳩巢大意本《官刻六諭衍義大意》。

一七二五年（尙敬十三，雍正三），程順則所編纂的《中山詩文集》問世。此為琉球首部漢詩文集，同時也是研究久米村漢學、以及瞭解琉球詩人的詩文創作力量上一項相當重要的資料。本詩文集主要收錄程順則的作品，以及其他久米村前輩與同事、福州恩師等人的詩文作品。

程順則五次前往中國，每度於返國之際所自費出版與購買的資料數量相當龐大。一部份印刷木版被保留在福建柔遠站，也有一部份被帶回琉球。帶回琉球的資料中，亦有部分在其後被日本大量出版與流傳。《六諭衍義》便是其中的代表，它在江戶時代被各藩的寺子屋（學校）當作教科書，為江戶時期的庶民教育帶來重大影響。而福州恩師陳元輔所寫的《枕山樓課兒詩話》在附上程順則的序文後於京都出版，成為一本深受大眾歡迎的寫詩入門

書。程順則以琉球為據點，並廣及於中國、日本等地的活動，成為久米村漢學發展的最盛期之表徵。

(二) 蔡溫¹⁴

蔡溫（1682-1761，康熙二十一至乾隆二十六）較程順則年輕約二十歲，比程順則長男程搏九年輕一年。他繼承了程順則，成為打造琉球政治與文化黃金時代的人物。

根據家譜所述，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蔡溫以十二歲的少年通過秀才考試，十五歲元服後成為秀才（俸米一石）。到該年為止與其弟一同閱畢大學中庸。曾向講談師匠求學，但幾乎無法理解。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十六歲那年的八月十五日賞月遊玩時，遭到友人侮辱其學問程度不佳，因此便奮發向上努力向學，成為蔡溫人生第一次轉機。

一七〇八年（尚貞四十，康熙四十七），二十七歲擔任進貢存留役，並奉命學習地理。福州長樂有一位地理專家——劉霽，蔡溫便以三十銀兩向他換得大羅鏡一面與密傳之書。翌年夏，為避暑而造訪錦雞山的凌雲寺，並由長老介紹一位出身湖廣的隱士。和這位隱士的會面，成為蔡溫人生的第二個轉捩點。

隱士在對談過程中，指出閱讀蔡溫的詩作與儒學潛力後，推知其學問之路只會持續到二十八歲為止，不論如何用心創作詩文、閱讀書籍，都不過是工藝精細的作業，與真正的學問還是有一大段差距。原因在於，四書六經才是述說治國大事之書，如果放棄此要領而執筆創作，終究是拘泥字面形式、模仿古人、毫無創見、不知所云的作品。

蔡溫受教後，遂深自反省自己的學問態度，從學於此隱士，習得學問的精髓與政治的根本。

14 有關蔡溫事蹟，請參閱前揭書〈蔡氏家譜〉。

一七一〇年（尙益一，康熙四十九），二十九歲時返國。曾策馬在北部地區旅行，留下許多漢詩作品。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三十一歲二月任職法司座（三司官座敷），七月成爲國師。

一七一六年（尙敬四，康熙五十五）三十五歲，因進貢兼請封之故，被任命爲正議大夫前往福州，卻於航行途中遇上暴風，返回久米島，翌年再從久米島出發至福州。此爲二度至福州。

一七二八年（尙敬十六，雍正六），四十七歲擔任三司官（行政首長），兼任國師。前輩程順則於該年擔任名護間切地頭一職。

一七五二年（尙穆一，乾隆十七），七十一歲辭職前的二十四年間，一直擔任三司官。國師一職則在七十六歲時，以高齡爲才得以致仕，任職期間長達四十七年。

他撰寫許多包含監督治水土木工程，以及農業與林業的著作，成果流傳至今。除《澹園全集》（收錄家言錄、客問錄、實學真秘、治家捷徑、居家必覽、圖治要傳）以及《澹園詩文集》外，另有〈平時家內物語〉、〈御教條〉、〈蓑翁片言〉、〈獨物語〉、〈醒夢要論〉、〈俗習要論〉、〈自敘傳〉、〈家道訓〉、〈農務帳〉、〈山林真秘〉、〈林政諸規則〉等豐富的作品。

蔡溫修習儒學，同時也對林政、農政、治水等治國事業有所貢獻，因此有人認爲與其稱之爲儒學家，不如視之爲一位重實務的政治家。一八〇〇年（嘉慶五），李鼎元以尙溫王冊封副使身份來到琉球，批評他是「學朱子而未純者」¹⁵，可謂偏重蔡溫實學取向所做的評價。

15 李鼎元在〈使琉球記〉嘉慶五年六月十七日條中言：「大雨竟日，長史覓得法司蔡溫、紫金大夫程順則、蔡文傳三人集，詩皆有作者氣。順則別著〈航海指南〉，言渡海事甚悉。蔡溫尤肆力於古文，有〈蓑翁語錄〉、〈至言〉等目，語根經籍，有道學氣，間出入二氏之學，蓋學朱子而未純者」。收錄於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九二冊，《清代琉球記錄集輯》（第二冊）。

伍、教育制度的改革與久米村的抵抗

琉球國都首里於一七九八年（尙溫四，嘉慶三）開始設立學校，較久米村明倫堂遲了將近八十年。最初稱為公學校，後於一八〇一年（尙溫七，嘉慶六），改稱為國學。

如前所述，首里當地最早是由僧侶引進漢學。其後，南浦文之的弟子泊如竹繼承了日本朱子學泰斗桂菴禪師的學風，於一六三二年抵達琉球，成為國王尙豐的侍讀，負責傳授薩南派朱子學。如竹將文之點的訓讀方法引進琉球，為朱子學的普及帶來極大的貢獻。然而「由於當時首里無正規學校，遂僅能聘請老師至學齋等名門大家府邸內，聚集五六人教之，或於家庭內向父兄或其他師長學習」¹⁶。

有鑑於此，尙敬王代（1713-1751）主張首里亦應設立學校，獲得廣泛認同。但是當時的三司官蔡溫（也是尙敬王女婿）卻認為設立學校為時過早，他指出唯有在實現理想的政治後，才可設立學校，於是首里始終未能設置國學或鄉學校。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琉球的教育機構就只有專為久米村子弟而設置的久米村明倫堂。

於首里設立學校的長年懸案，一直要到十二歲即位的尙溫王與其國師蔡世昌的努力下，才得以實現。蔡世昌於尙溫三年（1797）時擔任國師，有效地影響政策的決定與實行，並大刀闊斧進行創設學校的計畫。真境名安興所著《沖繩教育史要》中，指出當時是在蔡溫理想的政治獲致實行後，終於跨出設立學校的一步，表示琉球已經邁向文化成熟的高峰期。他說：

尙敬王時代，沖繩之政治已近乎完善。尙穆王時代，則象徵文化的成熟，但當時釀成階級制度幾乎無法維繫的悲劇，有如翻越高嶺後漸趨下坡。及至尙溫治世，卻能挽回積年頹勢並於最後綻放光芒，該治世能錄用人才實施新政，建立常軌，並令設學的理想得以實現¹⁷。

16 真境名安興：《沖繩教育史要》（沖繩：沖繩書籍販賣社，1965年），頁81。

17 同《前揭書》，頁117。

尙溫王與蔡世昌兩人的相互配合，促進了琉球制度的改革。首先，他們堅決實行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培育人才。除了在首里設置國學外，也試圖改革留學生（官生）的派遣制度。這兩項政策皆與久米三十六姓的利害有關，因而爆發激烈的反對聲浪。在設立國學方面，由於長期以來久米村的明倫堂是琉球唯一的教育機構，獨佔教育之優勢；而在官生派遣方面，明代後葉所派遣的人員幾乎全來自久米村。久米村民感於既有權勢可能就此喪失，擔心自己在琉球國內的地位也許因此動搖，充滿危機感的久米村民於是群起反對改革，發動激烈的抵抗運動。

在此要特別提到的是，推動改革負責人蔡世昌與持相同主張的鄭孝德，都出身久米村，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三），更與同為久米村子弟的梁允治、金型一同擔任官生，奉派至國子監，直接從學於《琉球入學見聞錄》的作者潘相。梁允治與金型入國子監不久後，即因病逝世，而蔡世昌與鄭孝德則以優越成績學成歸國。由此可知久米村人民對兩人應抱持殷切的期待。意外的是，兩人竟成爲左右久米村未來的改革者，破壞久米村的既得利益，這樣的背叛行爲備受村民指責，尤其是地位較高的蔡世昌。

蔡世昌擔任國師翌年（1798），就建議改革官生制度與設立學校。兩項都是改變舊有制度的重大改革方案，會引發久米村的反抗，應屬意料中事。但蔡世昌依舊堅持推行此項改革。

原本四名官生都來自久米村，改革之後卻有半數是首里人。此舉引發久米村強烈反彈，不斷謾罵、誹謗蔡、鄭兩人，往兩人家中丟擲石塊，或潑灑糞尿於兩人家門前，極盡破壞之能事。王府得知此事後，遂逮捕相關責任者入獄，主謀者甚至被處以流刑。這就是著名的「官生騷動」¹⁸事件。

18 請參閱比嘉春潮：〈沖繩の歴史〉第五十九項・官生騷動，《比嘉春潮全集》第一卷（沖繩：タイムス社，1971年），頁292-297。

陸、設立首里國學

「官生騷動」尙未退燒，一七九八年（尙溫四，嘉慶三）開辦了琉球最高學府公學校（後來的國學）、並設置平等學校。當時不以國學命名，而稱之公學校的原因在於久米村的官員根據中國國學會典，以爲未附設聖廟的學校，則無法稱爲國學。

公學校最初臨時設置在中城御殿（世子官邸），二年後移至當藏村勘定座，一八〇一年（尙溫七，嘉慶六）於龍潭池旁建立新校舍，並首次名之爲國學。國學學師（校長）原本內定蔡世昌，然蔡世昌或因「官生騷動」事件憂心勞力而於國學落成前夕病倒，遂改由林家槐繼任。

尙溫王爲慶祝國學開學，親自執筆撰寫「海邦養秀」的匾額，並發佈〈國學訓飭士子諭〉，聲明建學的過程與教育目標。可惜滿腹理想的年輕國王尙溫卻於翌年（1802）十九歲時逝世。教育改革的主要人物尙溫與蔡世昌兩人，都未能親眼看到他們親手推動的改革成果，但他們的確在琉球教育史上寫下耀眼的成績，並廣受後世好評。《中山世譜》中以「王寬仁大度，好學重禮，文風大興，社稷奠安」¹⁹來讚美尙溫王短暫的生涯。

與久米村明倫堂不同的是，記載 立的過程與教學內容的資料，依舊被保存至今。關於首里國學的描述，以〈國學訓飭士子諭〉²⁰爲最重要的資料。全文如下：

稽古之學校，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皆所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今予國都，自古以來，未建泮宮，典尚闕如。應建國學，興教化，育人材，以臻美備。然現今國財未裕，不遂興建之志。故於舊官署，權爲國學，著派按司向國藩，紫巾官向元佐，充國學奉行。並令當座官，金世裕、麻克昌、偕爲中取役，督理學務。

19 〈中山世譜〉，頁191。收錄在伊波普猷、東恩納寬惇、橫山重編：《琉球資料叢書》第四卷，鳳文書院，1940年初版，1988年復刻。

20 原文請參閱同〈前掲書〉，頁179。以及《沖繩縣史》第十四卷資料編四〈琉球藩雜記五〉（雜事 學校醫院 寺社）（二）學校規則。

……既又簡派金大夫蔡世昌，以爲學師。公同議立學規，薰勸諸生，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域樸作人之意。今蔡世昌，不幸病。故乃命中議大夫林家槐，充補學師，特製訓言，警飭諸生。其各諦聽。

蓋古之學者，先立品行，次及諸藝。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鄉學，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

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務化僞盈之氣。常防蕩軼，毋事逸遊，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

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或聽官長，或營私獻媚，出入權門，或依附勢豪，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樹黨爲援。又以當悲當恨之行，反爲得計，而不公不道之事，罔顧害人。

乃若此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脫褫朴濫竊章縫。返之於衷，寧無愧乎。種種弊端，深可痛恨，故返復惓惓，特宣訓言，使爾等共體予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勤學積行。逢時得志，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先，亦增光寵矣。

若乃玩愒勿儆，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于咎戾，國法具在。予亦不能爲爾等寬矣。

自茲以往，無論名門與寒陋，如有積行勤學，爲國宜猷者，則雖布衣子弟，我將舉而用之。如或敗檢踰閑，不遵明訓者，則雖貴族子孫，我將退而去焉。

凡各學，奉行師長，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薰勸，以副予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逭，勿謂予言之不預也。

爾多士，尚謹聽之哉。

嘉慶三年戊午穀旦訓飭子諭

本訓示充分顯示出年輕國王亟欲培育人才的理想。文章之首以中國爲例，說明設置國學的必要性，並提及原任公學校學師的蔡世昌因病無法成爲國學校長一事，對於創學有功者寄予無限遙念。所謂「先立品行，次及諸

藝」蘊含了對學習者的期許，強調品行重於一切。「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也是此義。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自茲以往，無論名門與寒陋，如有積行勤學，為國宜猷者，則雖布衣子弟，我將舉而用之。如或敗檢輸閑，不遵明訓者，則雖貴族子孫，我將退而去焉」一段話，描寫進用人才的基本理念和方針。透露出對士族階層與門閥勢力的強烈戒心，並宣示任用人才將秉持實力主義，只要是「積行勤學」者，即便是身份低賤，也將加以錄用。相反的，未勤奮向學者，即便是貴族子弟也絕不錄用，不容許特權，只要求累積嚴厲的修練。

柒、國學各項規則與教育內容

標示國學教育方針的學則，是直接引用朱子白鹿洞書院的教條。即「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與「接物之要」。舉例而言，「五教之目」當然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是儒教的基本德目「五倫」。其他有步行、言語、衣冠、容貌、飲食等，在此予以省略。

壁書是為校內應遵守的規則，也公告各項課程的學生數目與入學資格、年齡等。學生數目並無嚴格規定，會依情況不同而略有增減。一般來說，講談課程的學生人數約有二百六十人、官話詩文課程的學生約有四十人。只要是畢業於平等學校（國學之下設機構，接受十五至十六的學生入學）的學生都擁有入學資格，入學年齡為十七至十八歲，在學期間最長為七至八年，也允許到其他課程旁聽。講談課程的學生大多希望將來擔任行政官、外交官（派遣至中國的大使）、事務官、經學師匠等，教科書以四書五經、近思錄、史記等歷史書、唐詩、呈文、咨文、錄文、論說等為主。官話詩文課程的學生則多希望擔任外交官（派遣至中國的大使）、製作公文、翻譯、教職員等職位，教科書以官話（漢語）、詩文、作文、作詩為中心。

考試制度方面，分為每個月舉行一次者、以及期末（每年二、五、八、十一月）舉行者兩種。講談課程的考試科目方面，包含四書體註（約一頁

半），五經中的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各一頁半），訓點二十一史（一頁半），學生根據師匠於呈文、咨文、錄文、論文中選定的題目起草文章（約三頁）。官話詩文課程的考試科目有官音（四聲句讀）、「尊駕」、「百姓」與「人中話」，朗讀（一頁），訓點四書體註（一頁半）與作詩。

國學的入學者身份，必須既是士族又畢業於平等學校者。其中士族中身份較高的貴族與出身門閥者，皆被強制要求入學，其他則按其希望接受就學。但是就如〈國學訓飭士子諭〉中國王的宣告般，若非畢業於國學，則無法成爲王府內之官員。

國學內有負責處理一般事務、監督學生、以及專任教育工作的人。擔任事務工作的稱爲奉行、中取、筆者，而擔任教育指導工作的稱爲師匠。奉行之中，按司奉行乃學校校長，親方奉行爲副校長，其下有中取二人、筆者二人、假筆者二人、聖廟排班工作人員等。師匠分成兩種：按司師匠負責教授門閥子弟、官話師匠則負責教授官話。

師匠選用條件是以官生身份自國子監學成歸國的人中，甄選出表現優秀者，任期三年。師匠以下有訓點調係（擔任助教工作）二人、再學（畢業於國學的研究生）三人、以及負責從旁協助師匠教育工作者。每天的課程從上午八點開始，傍晚六點結束。爲了隨時爲學生解惑，師匠必須日夜待在學校內²¹。

教科內容包含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等儒學經典，以及中國話的會話、公公文寫作、詩文創作等，大抵以朱子學爲主。平等學校作爲國學的下設機構，不僅與國學同時期設立，教育內容類似。只是平等學校的入學者年齡爲十五至十六歲，修業年限約五至六年。首里當地設置了三所平等學校。

21 同註20。請參閱同註的《沖繩縣史》第十四卷資料編四所收（二）〈學校之規則〉中的〈覺〉項目。

除平等學校外，首里還在一八三五年（尙育二，道光十六）時設置村學校。當時首里有二十個村，共設置三所平等與十四所村學校。未設置村學校的村莊子弟則至附近學校就讀。

捌、結論

琉球的久米村與首里兩地，作為文化的中心，各具特色，在教育上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兩地在不斷相互抗衡、融合，之後取得平衡，使得富含儒學成分的琉球文化開始顯露自己的特徵，並得以持續發展。

泊如竹引進源自日本薩摩的訓讀（文之點），與既存在的僧門學問相結合後，普及於琉球士族等各階層中。訓讀也影響了久米村子弟。潘相的《琉球入學見聞錄》〈誦聲〉項目裡，曾具體記錄琉球地區如何閱讀《大學》文章開頭的部分²²，可見薩南學派的訓讀方法已經擴及至久米村。我們也可從《大島筆記》（1762）更瞭解當地實際狀況。文章具體地描述了久米村明倫堂的教育內容，曰：「琉球之學校以小學四書六經為業……學校規模不大而與聖堂並立……學校名為明倫堂，……久米村之學官依本唐教直讀也，即講官透過國讀而教之也，點本採用薩摩僧文之之點爾」²³。

久米村的儒學，就如同程順則與蔡溫等人之例顯示的，是以朱子學為基礎，其中蔡溫的學問又更偏向實務性。

首里的國學教育，同樣以朱子學為主。由國學的教育內容我們得知官員者除了必須學習儒學外，也必須學習公式外交文書（呈文、咨文等）、漢語及作詩等等。

22 潘相的《琉球入學見聞錄》中記載琉球訓讀的方法：「大學之道（大學，ダイアカ；之道，ノミツハ。總讀云：ダイアカノミツハ），在明明德（明德，メトタ；明，アチラカニスルニ；在，アリ。總讀云：メトタアチラカニスルニアリ）」。請參閱《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九冊》《清代琉球紀錄集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2年），頁85-90。

23 收錄於戶部良熙著：《大島筆記》《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東京：三一書房，1968年）。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瞭解不論對首里的國學、或是久米的明倫堂而言，所謂的教育就是學習儒學。同時，兩地的教學都涵蓋了漢語練習、作詩、及寫作應用文等課程。此外，首里在文本的訓讀法中，涵蓋了漢語的學習；久米村則以中國式的直讀為基礎，與訓讀同時並行。◆

引用書目

- 上里賢一
1998 《校訂本中山詩文集》（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98年）
- 小島瓊禮
1986 〈芥隱承琉傳〉，《球陽論叢》（那霸：ひるぎ社，1986年）
- 小島瓊禮、金城美智子
1991 《首里城正殿の鐘と墨繪「光と影の世界」》資料編（沖繩：沖繩綜合圖書，1991年）
- 戶部良熙
1968 《大島筆記》，《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東京：三一書房，1968年）
- 比嘉春潮
1971 《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沖繩：タイムス社，1971年）
- 伊波普猷、東恩納寬惇、横山重（編）
1988 《琉球資料叢書》第4卷，（鳳文書院，1940年初版，1988年復刻）
- 仲原善忠
1977 〈官生小史〉，《全集》第1卷（沖繩：タイムス社，1977年）
- 西村時彦（天囚）
1975 《日本宋學史》（東京：梁江堂書店，明治42年），參閱鹿兒島市：《薩摩の文化》總論，第一宋學部（1975年）
- 李鼎元
年代不詳 〈使琉球記〉，《台灣文獻叢刊》第292冊，《清代琉球記錄集輯》（第2冊），年代不詳
- 村井章介
1995 《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
- 汪楫
1966 《使琉球雜錄》卷15，（那霸：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1966年）
- 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
1983 〈久米村〉，《沖繩大百科事典》上（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年）

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編）

- 1980 《那霸市史》資料篇第1卷6，家譜資料2（那霸：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1980年）

家坂洋子

- 1982 《薩摩薩繪卷：儒者泊如竹の生涯》（東京：八重岳書房，1982年）

真境名安興

- 1965 《沖繩教育史要》（沖繩：沖繩書籍販賣社，1965年）

潘相

- 1972 《琉球入學見聞錄》，《台灣文獻叢刊第299冊》《清代琉球紀錄集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72年）

